

人民币国际化策略

周 宇

内容摘要：本文还将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成为我国制定对外经济发展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汇率制度安排存在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说，提高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可能削弱政府维护汇率稳定的能力。因此，我国政府在权衡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时，还应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对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人民币 国际化 资本项目开放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从历史经验来看，当一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该国货币将会自然发展为国际货币。19 世纪的英镑、20 世纪的美元、20 世纪后期的日圆和马克、21 世纪的欧元都反映了经济实力与本币国际化的联系。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化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变化。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在边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人民币开始流通于一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种种迹象表明，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将会在国际舞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就长期展望来看，一些学者和专家推测，在今后的 20 到 30 年内，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世界货币。届时，人民币将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性国际货币。

就今后的发展趋势而言，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越广泛，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明显。因此，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会成为我国强国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强国战略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对本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即经济实力的提高会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一侧面

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客观性和必然性问题,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是否一定会成为国际货币?在怎样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下,人民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第二个侧面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和作用,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会怎样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可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实惠,但享受这些实惠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利益与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期的特定经济环境。由此可见,第二个侧面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问题。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问题研究。虽然,经济实力的大小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主要客观因素,但另一方面,制度性因素也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条件之一。制度性因素是政府能够控制的重要变量之一,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而言,政府可以在充分把握其利弊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调整控制其发展进程,从而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服从于强国战略的需要。从 GDP 的总规模来看,我国已经属于经济大国,但就人均 GDP 而言,我国仍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特殊的经济环境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提出了特殊要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政策选择会对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和汇率制度安排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选择会加速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而资本项目的开放会削弱政府维护汇率稳定的能力。考虑到以上因素,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应服从整体经济发展策略需要。

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问题,在进入以上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将探讨当前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争论的一些主要内容。

一、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的展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一问题受到重视的原因有:第一,从 GDP 的规模来看,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而且,在今后的 10 年内,我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过德国和日本。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人民币开始大量在周边国家和港澳地区流通和使用,这意味着人民币已经走出国门,在通向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以上背景的影响下,近年来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讨论明显增多,这些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和时机。就可能性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在具体的时机问题上,学术界则存在较大的争议。基于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这一事实,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政府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现阶段谈论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在这一问题上,国外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观点,如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曾断定人民币 5 年内有望成为国际货币,而德国前总理密特朗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鲁迪、登布森则认为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需要 20 年到 30 年的时间。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现状评价。当前,我国一部分边境贸易可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且,我国旅游者可在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已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一般来说,国际学术界通常把一种货币在世界外汇交易、进出口结算、国际债券发行以及各国外汇准备中的份额作为衡量该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标

准。依据这些标准进行判断,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几乎接近于零。当前,在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方面,可量化的指标只有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数量。该数量有1000亿、300亿,200亿和10亿人民币等几种推测。

第三,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可能性。近年来,随着与大陆之间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以及来自大陆旅游人数的增加,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明显增加。随着人民币在香港的广泛使用,一些学者提出了将香港建设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议。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助于扩充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功能,同时也有利于把人民币流通纳入银行监管系统,但这种选择有可能削弱政府对资本项目的管理能力。

以上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讨论的几个主要方面,从人民币国际化的展开状况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至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现象主要集中于现金流通领域,通过银行系统的人民币国际结算几乎处于空白状况。这种状况主要起因我国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从制度方面的制约来看,人民币通往国外的渠道只要旅游和边贸等现金流通渠道。银行系统的人民币国际结算被限定于边境地区的小额贸易,而大贸易下的人民币国际结算仍属于禁止对象¹。另外,对外金融、资本交易方面的人民币使用也属于禁止范围。因此,与其他货币、尤其与战后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明显偏重于现金流通领域。60年代,在马克和日元开始发挥国际货币职能的初期阶段,尽管这些国家还在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但经常项目下的本币使用已经开放,这一状况为银行系统下的本币对外结算和非现金渠道的本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从国际收支的具体项目来看,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旅游和边贸发挥着主导作用。就外汇管理制度而言,我国居民出国可以携带一定的人民币现金出境,边境小额贸易可以使用现金和通过银行进行结算,这一状况为旅游和边贸途径的人民币出境提供有利条件。另外,我国与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经济和民族及地理联系,也是导致人民币通过旅游途径大量出境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方面的密切交流,提高了香港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而来自大陆的大量旅客为香港提供了人民币供给。这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开始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人民币国际化起步不同的是,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般贸易和一部分低风险的资本项目。这种区别与经济规模、经济发展层次、以及资本管理方式的不同有着密切联系,由于我国经济 and 贸易规模较大,因此,人民币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就出现了国际化倾向,而这一阶段所固有的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特点。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从区域上看,主要集中于边境国家和地区,这与60年代马克与日元国际化的展开也有所不同。上面论述的特点、即以旅游和边贸为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决定了人民币的境外使用只能开始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另外,从货币的信用度来看,人民币的信誉要明显好于周边国家货币,这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和企业愿意接收人民币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三个特点,我们可以归纳出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重要结论。结论之一是,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按照进出口结算中的本币使用份额、银行国际贷款中本币的使用比率、本国债券的非居民持有率、国际外汇市场上的本币交易额等标准指标进行衡量,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很低水平。因此,当前不宜过高评价和宣传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结论之二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具

¹ 2008年12月,国务院出台政策准备试行大贸易下的人民币结算。

有无穷的发展潜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出现在我国经济开发的追赶期,其发展受到外汇管理制度的严格限制,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层次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将会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性

21 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性经济强国的趋势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这一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人民币将会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已经开始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这一状况向理论界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如何解释当前出现的人民币国际化现象,我国经济实力的变化正在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将通过贸易途径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贸易依存度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贸易规模的扩大,另外,即使在经济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可以通过贸易依存度的变化促进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贸易规模的扩大是促进本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一国的贸易规模越大,非居民对本币的需求就越大,本币在境外的流动性就越高,这是形成本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就人民币而言,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的扩大是引起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我国边境地区的贸易主要以美元等国际货币为媒介,或者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当时,贸易规模较小是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在贸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非居民使用和持有人民币存在流动性较差的问题,即除非有直接从中国进口货物的需要,否则接收人民币支付将会大大降低资产的流动性。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明显提高了对人民币的需要,而后者又改善了人民币在境外的流动性状况,这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愿意使用 and 接受人民币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民币汇率稳定和人民币对外信誉的提高是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另一重要原因。人民币对外汇率的稳定提高了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性,这是人民币在境外受到欢迎和非居民开始涉足人民币资产投资的另一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人民币汇率所面临的升值压力不仅提高了人民币作为支付和决算货币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魅力。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到 90 年代中期为止,人民币对外汇率一直处于贬值状态中,这一时期的人民币贬值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90 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90 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一部分国家的货币汇率出现了大幅度贬值,与这些货币相比,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出现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的这一变化使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受到青睐,这是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即人民币在境外被非居民持有和使用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部分内容,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重要组成是非居民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就合法渠道而言,2002 年,我国已开辟了 QFII 的投资通道,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另外,2002 年以来,随着

国内外利差的扩大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出现,各种变相的或非法的非居民人民币资产投资明显增加、如在 2002 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华侨汇款的增加导致经常转移项目出现 130 亿美元的顺差,这类汇款实际上有一部分为非居民的人民币投资。此外,2003 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幅度要明显大于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双顺差的合计,这部分误差高达 250 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资金实际上为非居民的非法人民币投资。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今后,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有可能逐步发展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降低成本和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动力。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使用当事国的货币还是使用第三国的货币会对交易成本和风险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使用第三国货币相比,使用当事国一方的货币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和风险。二战战后初期阶段,欧洲国家主要使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60 年代以后,随着德国经济的崛起,马克逐步成为欧洲国家使用的主要国际货币,这是因为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与德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更为密切。从马克国际化的经历来看,随着我国与亚洲国家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美元,在亚洲地区发挥主要国际货币的作用。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分析

我国政府是否应该采取积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呢?这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检验本币国际化的主要长处和可能伴随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可以获得货币发行利益。当人民币广泛被其他国家使用时,一部分人民币纸币将在境外流通,在国际上发挥结算和支付等货币职能。人民币之所以流向境外、进入非居民手中,是因为我国居民在购买外国产品时,使用人民币进行了对外结算和支付活动。如果这部分人民币一直停留在境外,其经济效果如同我国无偿占有和使用外国的财富。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创造财富的效应,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越高,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数量就越多,我国可无偿利用的外国财富就越多。人民币纸币实际上属于中央银行发行的债务凭证,人民币无论在国外停留多久,这种债务关系并不消失,因此,一些学者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一利益视为如同长期无息借款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考虑到一部分人民币会永远停留在境外,因而,也有一些学者把这部分利益视为外国财富的无偿占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常把这种货币发行利益称为国际铸币税收入。

另一种间接货币发行利益是短期负债和长期资产之间形成的利差收入。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铸币税收入来自于境外流通的本币现金。然而,将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主要表现为银行系统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和其他形式的人民币资产,这部分资产与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现金一样,同样也构成我国的对外负债。一般来说,我国对非居民的这部分负债多为短期负债,而我国金融机构将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长期投资。长期资产和短期负债之间利差收入是货币发行国可以获得的另一重要利益。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降低国内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而我国企业又不得利用这些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时,我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必然面临巨大的汇率变动风险。在我国实行美元盯住汇率

制的情况下,虽然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化得到控制,但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处于变化之中。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减轻和消除国内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一旦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贸易结算,企业经营活动将可以避免汇率风险的困扰,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利于减轻由币种错配而引发的融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外币借款,这样就导致了资产与负债的币种错配问题。在这种状况下,一旦汇率发生意外变化,微观层次的企业和宏观层次的国民经济都会遭受巨大的打击。然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和政府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人民币融资,这种本币融资可以避免币种错配引起的金融风险。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如上文所述,人民币现金流出国境只是人民币国际化一部分内容。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对外业务将成为银行系统的重要业务之一,人民币业务是我国金融机构的强项,因此,人民币对外业务的展开有利于改进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体质和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地位。另外,今后,人民币国际化将延伸到非居民对人民币资产的大规模投资。外国投资者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扩充市场规模和强化规模效益,而且还可以给我国带来新的投资理念和新的改革压力,这种变化有助于推动和改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以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好处。与这些利益相对应,人民币国际化也伴随一定风险。一般来说,本币国际化的风险性质和程度与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有着密切联系。

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原则上不干预外汇市场,所以不存在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由于这一特点,本币国际化不会构成对汇率制度稳定的威胁。另外,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本币国际化对金融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浮动汇率制下的本币国际化政策有可能加速本币升值的速度和程度,这是因为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资产市场会加大本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规模较小的情况下,非居民参与本币资产的投资有可能加大汇率的浮动幅度。

与自由浮动汇率制相比,固定盯住汇率制更容易遭受本币国际化负面效应的影响。在固定盯住汇率制度下,本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会削弱政府运用金融政策的能力,这一负面影响的大小与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德国和日本经济都曾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保持国内金融政策的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限制本币国际化的政策。这是因为非居民对本币资产的需求增加了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难度。

另外,在固定盯住汇率制度下,盲目的本币国际化政策有可能成为助长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本币离岸市场成为国际投机家向亚洲国家货币发起进攻一个重要渠道。例如,在泰国金融危机中,一些投机家曾在离岸市场大量借入泰铢进行卖空交易。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学者认为,盲目的泰铢国际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泰国政府维护固定盯住汇率制的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程度和性质与汇率制度存在密切联系,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首先应该保持与汇率政策的协调。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

在如何制定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方面，我们认为应考虑到我国经济的以下重要特点：即一方面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另一方面，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的这一双重身份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矛盾。经济大国的身份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增加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风险。这一特点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遵循渐进的改革方式。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金融领域里推行的是渐进式对外开放，金融开放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人民币只能遵循渐进的国际化方式。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应该分为局部国际化和全面国际化两个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局部国际化的策略。局部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区域方面以东亚和周边地区为主，第二，在业务方面以经常项目为主。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而且我国货币的稳定状况要明显好于这些国家，这些因素决定了初期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将主要发生在东亚和周边地区。另外，资本项目管理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是妨碍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使用的主要障碍，这一客观条件决定了初期阶段的人民币对外使用将主要用于经常项目结算。

尽管我们强调谨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必要性，但就当前的状况而言，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已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币已于 1996 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性，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结算至今仍受到严格限制，这种状况既无益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也不符合我国经济大国的地位。从战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本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尽管这些国家曾经限制资本项目下的本币使用，但几乎没有国家限制经常项目下的本币使用，这是因为经常项目下的本币使用风险要明显小于资本项目。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我国在经常项目下推广人民币结算的时机已经成熟。确立“人民币外汇”这一新的概念，在经常项目下广泛接受人民币对外结算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先决条件之一。

另外，现阶段，我国还可以在一部分与出口密切相关的资本项目下试行人民币对外融资，其中包括给非居民提供支持国内产品出口的人民币对外贷款、对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提供专项人民币贷款。此外，也可以考虑让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在我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外国政府持有我国政府债券。国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不涉足货币投机活动，因此，在非居民接近和持有人民币资产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优先于私人部门。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为了促进非居民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应容许非居民开设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结算账户，这种账户可类似于日本 60 年代的自由日元账户。为非居民开设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结算账户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之一。

参考文献

赵海宽（2002）《论人民币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之一》，《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 5

期。

钟伟（2002）《略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世界经济》，第3期

姜波克（2000）《人民币境外流通问题初析》，《东方证券研究》，第6期。

王雅范,管涛,温建东著(2002)《走向人民币可兑换：中国渐进主义的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

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年报》（日语），各年版。

河合正弘（1992）《日元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现状》（日语），有斐阁。

ASEM(2001), “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 discussion paper jointly prepared by French and Japanese Staff for the Asia and European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Kobe, Japan, in January 2001.

Calvo Guillermo A. and Carmen M. Reinhart(2000), “Fear of Floating”, NBER Working Paper.7993.

Cooper, Richard.(1998), “Should Capital-Account Convertibility Be a World Objective”,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Deutsche Bundesbank. (1991),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utsche Mark as Invoicing Currency in Foreign Trade”, Nov.1991.

Eichengreen, Barry and Ricardo Hausmann (1999). “Exchange Rate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7418

Fischer, S. (2001), “Exchange Regimes: Is the Bipolar View Correct”, IMF, 2001。

Frankel, Jeffrey A. (1999), “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NBER Working Paper 7338.

McKinnon, Ronald I. (2000), “After the Crisis, 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 Resurrected : An Interpretation of High-Frequency Exchange-Rate Pegging”, Stanford University.

Mussa,M., P. Masson, A. Swoboda, E. Jadresic, P. Mauro, and A. Berg(2000),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a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World Economy”, IMF Occasional Paper 193.

Obstfeld, Maurice and Kenneth Rogoff.(1995). “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 9, 4(fall), 73-96.

Radelet, Steven. and Jeffrey Sachs. (1998).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Diagnosis Remedies, Prospects”,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imeo.

注：该论文收录于《强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4年），个别内容有所调整。

作者简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国际金融室主任，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周宇